

◀ （上接 8 版）

而每批评吴宓之泥足深陷难以自拔之作茧自缚,而对于学术自由与人格独立之关系,陈更是有着清醒的认知,没有吴宓身上那一种夹缠不清的书呆子气。1919 年 6 月 3 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的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竟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今之留学生,其立言行事,皆动失其平者也。’”这可能是针对留学生群体习染欧风美雨,倡导恋爱神圣之说,每每单方面撕毁与故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预定之婚约,而欲在女留学生中选择新式女子之风气。胡适在 1918 年 9 月写成的《美国的妇女》一文里对此也有严厉的批评:“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他的妻子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也会吸点文明空气,不致受他的奚落。……这种不近人情的离婚……是该骂的。”而对于经济独立与学术自由之关系,陈寅恪也有深刻的论断。吴宓在 1919 年 9 月 8 日的日记里记载陈寅恪的言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 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数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唆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貽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学问不足以谋生,而经济独立才是人格独立的前提之一,这论断放在当今中国之学界,也同样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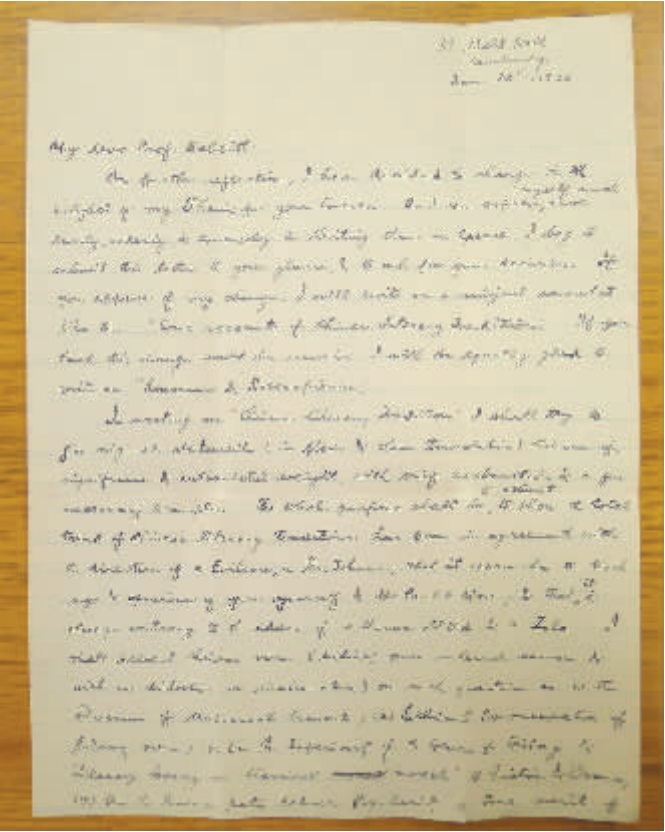
无独有偶,同居一室的学友汤用彤对吴宓也偶有严苛之批评,给吴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对吴宓热衷交际荒疏学问的指控,让吴宓久久难以释怀。吴宓其实并无长袖善舞之潜质,却又跃跃欲试于交际场合,所以真是有点用非所长自取其辱。据吴宓日记(1919 年 12 月 29 日)所记录,“近宓常有此感,但惜宓于诸学之藩篱,尚未尽涉耳。留美同人,大都志趣卑近,但求功名与温饱;而其治学,亦漫无宗旨,杂取浮撼。乃高明出群之士,如陈君寅恪之梵文,汤君锡予之佛学,张君鑫海之西洋文学,俞君大维之名学,洪君深之戏,

则皆各有所专注。宓尚无定决。文学与报业,二者究将何择,久久不决。现拟暂不明白划分,而乘时多读佳书,无论其为文学、历史、政治、时局、哲理等,但能选择精当,而所读既多,必有实益。且此心得安,则精神舒适,纵有琐屑烦恼,皆不足计较矣。凡学问事功,均须下苦功,未有不耕耘而收获者。锡予言,‘宓在清华时,颇有造成学者之志趣,之气度。及民国五六年间,在校任职一年,而全失其故我。由是关心俗务,甚欲娴习交际,趋重末节,读书少而心志分,殊可惋惜’云云。按宓近今之见解,以为人生应有之普通知识,及日用礼节规矩,例应通晓,且习之亦不必即害正业,故亟欲一洗前此偏僻朴陋之病,非有从俗学交际之心。且生来本无此才也。惟锡予既如是言之,复除亦尝有讥讽之意;是诚我之大缺失,亟宜改省。”吴宓自辩为欲借此一改中国读书人固有的书呆子气,却得不偿失,反而为友人所讥笑,以为他热衷于俗务倾心于应酬,就此而言,或许才能理解吴宓以读书来自我救赎获取内心安宁的“读书教”之所由来。读书写日记就成了吴宓的一种具有宗教仪式感的行为了。友朋学问日进,而自身几无寸功,吴宓自然就容易滋生沮丧愧疚之心情。他曾在日记里吐露心声道:“张君鑫海年少美才,学富志洁,极堪敬爱。此间除陈君寅格外,如锡予及张君鑫海,及日内将到此之楼君光来,均具实学,又极用功;在今已为中国学生中之麟凤,其将来之造诣,定可预知。学然后知不足,学愈深,愈见得自己之所得者尚浅。故如锡予与张君等,均又实心谦虚,尤足称道。宓于学问,毫无实功,今即与二君较,远不能望其项背;而年华已长,忧国伤乱,魂梦不安,又为种种邪魔杂念所侵扰。静中回首,虚靡之光阴,真不为少。欲纯静潜心用功,实难之又难,将来只可以常人终身。吁!可惊也,可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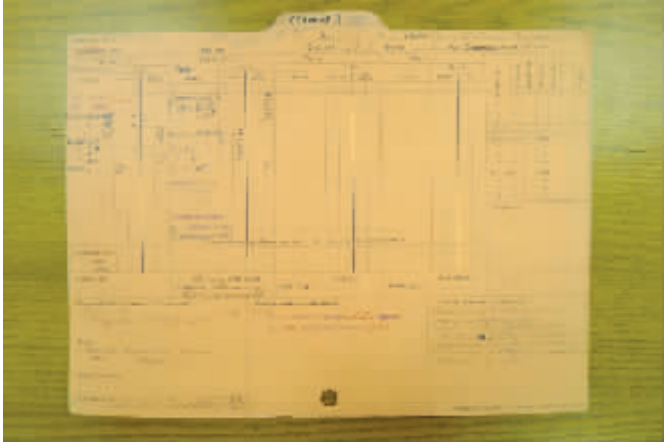
不过这是吴宓在哈佛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内部比较时所形成的自伤自哀情绪,所谓同辈如群星璀璨,而自己却才疏学浅,心志不坚,邪魔杂念缠身,安身立命无所寄托。而当他在日记里写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时,则自身属于波士顿或者哈佛留学生群体的一种自我肯定以及对纽约留学生的鄙视就遮掩不住地显露出来。一言以蔽之,在吴宓的笔触之中,剑桥才是追求真知、潜心读书之所在,而纽约这个花花世界却成了腐蚀

中国学生、毒化其心灵的城市。据其 1919 年 9 月 4 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杨孟纪来,复述在纽约所见中国留学生情形。若辈各有秘密之兄弟会,平日出入游谈,只与同会之人,互为伴侣。至异会之人,则为毫不相识,虽道旁见值,亦不头点招呼。其专门职业,共有二种,而读书为学不与焉。凡在纽约读书者,均只挂名校籍,平日上课,亦或到或不到。该处学位既亦取得,考试又皆敷衍,故无以学问为正事者。其二种职业为何?(一)竞争职位。结党营私,排挤异党之人。而如学生总会、年会之主席、会长等,及《月报》、《季报》之编辑、经理等,必皆以本党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争,卑鄙残毒,名曰‘Play Politics’。而国事及公益事业,则鲜有谈者,更安望其实力尽忠耶?(二)曰纵情游乐。无非看戏、吃饭、跳舞、狎妓等事,而日常为之,视为正业。于是奢靡邪侈,无所不至。平日相聚吃饭,或有请宴者,则必男女偕来,每一人束招一女留学生,(谓中国女学生,其在纽约者,皆甚不高明)入席则并肩坐。其情形酷类中国之招妓侑酒。”仅过三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昨记纽约中国留学生情形,而波城(康桥附近)之留学生则大异。波城及其附近,亦有留学生百余人,然大率纯实用功、安静向学者居多。在留美学界中,要为上选。(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课程亦较严,迥非纽约哥伦比亚等校之比。)而纽约之中国学生,则鄙夷之。谓凡来波城读书者,皆愚蠢无用之人,不如彼辈之活动能事云。”纽约与剑桥,形成了民初留学史上风气迥异、彼此仇视的两个星团,孰是孰非,有待留学史专家的进一步考证,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聚集在哈佛、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确实更为笃学自律一些,他们后来的学术与文化成就更是学界公认有目共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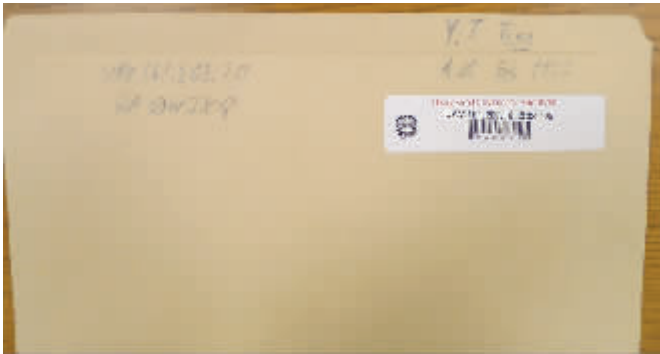
王汎森曾在一篇短文《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中谈及 19 世纪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们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当时维也纳的小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馆,晚礼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譬如维也纳的Cafe Grien-Steidl 咖啡馆就有包括了茨威格等大人物。以



吴宓致白璧德的信(1920 年 1 月 20 日)



吴宓在哈佛的修课成绩表



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汤用彤先生申请材料的文件夹及编号

此对照 100 年前聚集剑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真异地而同时之感,他们在此地风云际会地相遇相识,甚至相守一生,读书,交谈,思考,写作,逛书店,喝茶,吃中国餐馆,修课,求索中国文明的奥秘与出路……真真构成了学术生涯与心灵生活的高度契合,这是一个近代中国留学史上严重被忽略的群体。按照余先生的看法,这个群体确实很特殊,此前没有,此后也再没出现过,而这个知识群体面对中西学术与文化所展现的襟怀与抱负,尤其是

其中大部分的成员不以区分中西新旧为心魔,自由涵泳往复于多元的学术文化传统之中的态度,直到今天仍旧有启示价值。而一生虽然学术上无大成就的吴宓,却以其文人的细腻敏感和学者的严谨,巨细靡遗地记录了哈佛中国留学生的这个历史时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学术的备忘录,对于今人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格局中探索中国文化的由来与归途更是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